

悬念：

十字路口中国经济

- 计划、市场两茫然,20年双轨制已走到尽头!
- 把坏帐堆进“仓库”, 国企能否轻装上阵?
- 内部人控制, 权力市场化, 国资流失谁之过?
- 拨改贷、贷改投、债转股, 谁敢说是国企“最后的晚餐”?
- 减持国有股是否会引爆A股“炸弹”?
- 股市多风险, 银行有坏帐, 百姓投资何处去?
- 效益滑坡, 企业空壳, 谁为国企职工社会保障“买单”?
- 去年金融危机擦身而过, 明年是否会迎面相撞?
- 加入WTO, 是否为改革和发展的大突破提供了机遇?

贺晓东 / 著

Xuan Nian



哈尔滨出版社

悬念



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贺晓东 / 著 张明 / 策划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悬念：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贺晓东著.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0. 1

ISBN 7 - 80639 - 323 - 4

I. 悬… II. 贺… III. 经济发展 - 研究 - 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6922 号

悬念：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选题策划：张 明

著 者：贺晓东

责任编辑：刘丽奇

宋玉成

装帧设计：李法明

出 版：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编：150006 电话：6225167)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美亿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430 千字

印 张：17.25

版 次：200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5000 套

书 号：ISBN 7 - 80639 - 323 - 4/F·30

定 价：26.80 元

进入 WTO 前后的中国(代序)

北京时间 1999 年 11 月 15 日 3 时 52 分,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历经 13 年的漫长谈判和等待之后,中美双方终于签署了加入 WTO 的双边协议。在这一时刻,中美两国都以无比愉快的心情举起了酒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这样评价:“这个协议会使我们两国的贸易正常化,也会协助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美国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发表谈话说:“这确实是个名符其实的双赢协议;对基于出口的美国就业来说,这是一个赢;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这也是一个赢。”说得十分到位。的确,中国加入 WTO,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看到的是市场和就业,而中国则主要赢在获得彻底改革的契机上。

1999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进程可谓一波三折,好事多磨。4 月份朱总理访美时由于美方的犹豫,以致功败垂成。而美国单方面公布所谓中国开放市场的“清单”,更使国内不少部门及国企哗然和不满,甚至把签这样的协议斥之为“卖国”。在中国内部,包括决策高层内部,对加入世贸的议题也从“如何面对加入世贸后的挑战”退回到“要不要加入世贸”上。致使中国加入世贸,不仅有来自美国、西欧的“过份要债”的压力,还有来自国内一些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的强大压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内部对加入 WTO 面临挑战的主要担心最后集中在经济体制转换的压力方面。有消息说,中方代表在谈判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未被美方接受。美方代表认为:经济规律就是经济规律,就向水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莫非在中国水是从低处向高处流?人们终于看清了加入世贸组

Etb66/02

织的本质问题。如此一来,国内政治理论界对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担心产生了,反对加入世贸又多了一重政治上的理由。而江主席、朱总理恰恰着眼于加入 WTO 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作用,决定要不遗余力地促成。在中美代表正式签署协议后,中国世贸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人民大会堂作的中国加入世贸的报告中指出:现在中国经济改革正处于瓶颈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加入世贸,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外资和国际市场规则,利用外部力量推动中国的改革,成为中国决心接受开放市场条件的重要原因。他说,今天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做出中国必须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中国老百姓也许不一定马上感受到什么好处,就像当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一样,过十年二十年回头再看,就会发现当年决定意义的重大、影响的深远。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在运行体制上的体现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混合的双轨制。我在本书中已描述了双轨制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历史功过。在启动改革的初期,为解决农村土地和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在体制和价格上留一块活一块,客观上形成了双轨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超常发展,把吃饭问题稳住了。而后,把双轨制引进城市,用承包制来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承包制遇到经营行为短期化和缺乏市场评价的问题,在造成一定的损失和经济秩序紊乱之后,承包制被否定了。但双轨制对中国非国有经济的产生和飞速发展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短短二十年间,包括三资企业、乡镇企业、个私经济和那些戴“红帽子”的假国企在内的非国有经济在 GDP 中所占的份额已达 60% 强,利税的贡献也已超过国有经济老大哥。可是,非国有经济这块“无意插柳”与其说是干干净净改革的产物,不如说是“双轨制奶妈”偏心眼带大的“私生子”。这些年大家都看得清楚,国家控制的各种经济资源通过双轨制和腐败所营造的渠道迅速地向非国有部分转移,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另一方面培植了非国有经济的田园。所以,中国非国有经济这一块虽产生了不少腰缠千

万、亿万的大款和能人，却极度缺乏真正有作为的资本家和企业家。在微观领域，无论国有部门还有非国有部门，都很难见到真正的企业。

接着，八十年代末，双轨制在国内外受到大大的称赞。因为苏联搞休克疗法，企图市场经济一步到位，结果副作用极大。在官僚利益集团控制下瓜分国有经济，形成资本垄断集团和黑色经济，廉价收购民间股权，操纵经济，搞汇价投机，通货恶性膨胀，经济滑坡，人民受难。这时，渐进式改革的优越性突出了，西方人和俄罗斯人都称赞我们搞的“有权威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而我们自己在沾沾自喜的同时发现了这种体制存在许多问题，正所谓“鞋挤不挤脚只有自己知道”，可是脱了这双鞋又不知道该换什么鞋能合脚。

东亚金融危机又给了双轨制以展示其优越性的机会。正因为我们金融改革的滞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人民币才能幸免于难。正如克鲁格曼所云：“为什么这个作为亚洲奇迹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可以幸免于金融危机？难道中国的政策比其邻居都高明吗？与其邻居不同，能够挽救中国的原因在于，它的货币是不可兑换的，即在中国，你只有取得政府的证明文件，才可能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如果你要投机人民币，是得不到这些证明文件的。”^①但是，资本控制是有代价的。克鲁格曼进一步指出：“赋予政府官员发出或限制有利可图的优惠政策的权力，在任何体制中都是腐败的温床，中国也不例外。”^②而且，中国不会因管制资本而永远避免危机。克鲁格曼认为：中国极有可能重步其邻居的后尘，“但由于其货币的不可兑换性和没有巨额外债，危机的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一种可能的形式是出现大规模银行倒闭，原因

^① 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第199—20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② 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第20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在于政府没有及时注入大规模的现金去防止银行倒闭；而政府不加快印刷钞票的原因是害怕人们用这些钱去兑换美元，导致外汇控制失灵。另一种可能的形式是日本式的内部支出放慢，而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原因不是利率已经下降到零的水平了，而是在利率下降到零之前，政府只能慢慢地降低利率，防止人们绕过外汇控制实行资本外逃。两种危机的形式的根源都在于实质经济，即中国的银行体系问题很多，该国又无法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支出”。^①克鲁格曼所说的情况，正是我们目前所遭遇的问题。更为不幸的是，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和启动私人投资方面未见显效，中国在同大量银行坏账所引起的金融风险作斗争的同时，还不得不面对日本式的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两种危机形式有可能一齐发作。

东亚金融危机中，亚洲的四小龙、四小虎全卷进去了，而在体制和增长道路与东亚国家基本相同的中国却幸免了。但危机并未过去，危机的下一个受难者是谁？多数人把疑问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就像水落石出一样，当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光环消褪以后，中国经济内在矛盾和体制弊病浮上了水面。有人戏称：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软着陆，但是降落在沼泽地里，启动不起来了。其实，中国经济的退潮，不是一般的经济周期现象，而是双轨制内在矛盾使然。目前的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为什么启而不动？问题并不复杂，可以较直观地从投融资体制、国有、非国有企业的状况和社会保险系统状况中找到答案。举个房地产市场的例子，目前北京市住宅商品房平均每平方米价格在5000—8000元，而市民人均月收入不过千元，人民即使不吃不喝、“六亲不认”（对老幼不尽责任）也买不起房子。这种远在“天堂”的房地产市场是政府主导加垄断暴利的结果，根本不是市场行为，它要么降到“人间”来寻求有支付能力

^① 同上，第209页。

的要求,要么靠政府等公有部门的支出来支撑。这块市场的启动根本上是改革的问题而不是居民消费、储蓄行为偏好的问题。目前,针对市场疲软等通缩问题,政府屡次使用降息等货币政策杠杆,以图撬动国内需求,但并不奏效。原因就在于通缩不是通胀的反弹或对立物,更重要的是通缩不简单是货币现象,而且是一种体制现象,所以单纯的货币政策或凯恩斯通膨的办法是治不了通缩的。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微观经济体制问题,如果产权制度这个微观经济基础没有塑造好,那么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从根本上说就是畸形的,市场经济也必然是无序的。可是,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重构在中国现有的经济、政治体制框架中恐怕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它势必会带来强度很大的观念、利益和社会的冲突,发生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先例足以让中国的决策者们警醒。面临着改革与稳定两难的选择,中国又一次把改革决战的时间推迟了。1999年,针对银行和整个金融系统天文数字一般的坏账,对策是财政出钱核销一部分,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堆放一部分;针对国有企业的问题,提法是“解困”而非改革,对策是国内上市、海外上市,加上“债转股”等减债注资的办法。“债转股”一万多个亿,被人称之为“最后的晚餐”或最后一次“财政大救助”,但天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在新的世纪,中国经济的表现和中国经济的命运可能成为举世最大的悬念。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期间我们一次又一次用某一种新的企业改革形式一时性地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从承包制到股份制,从“拨改贷”到“债转股”,我们曾经多次认为已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已能够塑造出优于计划经济和完全市场经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我们很快发现,中国经济面对的矛盾,正是我们认为已解决的那类问题。而且,任何绕过产权制度问题的改革措施均不奏效。人们慢慢已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国有化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因为计划经济是由政府指令性计

划对资源进行统一配置的经济,只有国有经济才能保证其实施,因此计划经济必须以国有经济为主体。把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了,不解决企业的国有体制的问题,显然很难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

如本书的书名——“悬念: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所示,这部书只是要写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分析其原因,试图揭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矛盾,但并未像论述中国经济问题的著作或文章的惯常作法那样也写出一些对策来。所以,那些问题成了悬念。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经济的问题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恰恰相反,现今世界无论是热爱中国还是反对中国的人一致认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是最有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之所以看不到明确的预期,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们都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可以说在每一个经济问题背后都有深刻的体制根源。改革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任何在计划经济和国有体制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措施已无济于事,但要做最后的超越,可能会越出现存体制的底线。无论如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尽管其背后还仍隐藏着计划经济的影子,但国有经济的底线不能破。改革一旦在此破位,可能会引起一系列制度性的强烈冲撞和反弹,结果难以预料。因此,在目前已有的改革思路中,悬念只能是悬念,很难找到合适的答案。在目前的经济、政治格局中,中国也很难做到自我超越。

在本书写作辍笔之后的近10个月里,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加大了力度。银行第七次降息,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已降至20年来的最低,此外还开征利息税。财政在98年已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基础上,99年又发行了600亿国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宏观调控的强度相当之大。1999—2000年度是国企解困最后也是关键的阶段,为国企再一次大规模地注资又成了解救国企的主要手段。对于1999年出台的“债转股”的措施,那些亏

损累累的国有企业最感兴奋,把它看作计划经济“最后的晚餐”,而资产管理公司则是计划经济的“坏账仓库”。在北京的国家经贸委门前早已出现了大塞车的盛况,据说经贸委“债转股”的班子穷于应付,几易住址且保持“地下工作”状态,仍然被众多企业进京“跑委”大员们围困。据我看,“债转股”这一手虽然名义上减轻了国企负担,也使银行坏账有了一个暂时的说法,但并未从根本解决问题,对提升国企的经营能力和国有银行的经营水平不会形成实质的推动。而且,把坏账堆在资产管理公司,国家财政消化不了,最后还得回到银行,金融风险未减轻。更糟糕的是,债转股救国企破坏了市场运行机制,在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制度转换的过程中,它所付出的制度性代价的影响将是长远和致命的。

对于以上经济对策,许多中外的经济专家并不看好。最新一期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其封面报导中预料,中国经济将步入萧条期。首先是刺激内需的政策很难奏效,而且这一政策将对今后的经济改革形成潜在的威胁。其次,东亚金融风暴对中国货币形势带来强大压力,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国的银行完全不具备西方银行的操作技术,在控制市场短期利率等策略上,根本无法发挥效用。最后,失业问题恶化将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据统计,中国经济增长率每下跌一个百分点,下岗工人数就增加 200 到 400 万人。世界银行就曾提出警告,若中国无法解决这个两难问题,一旦经济增长率跌至 5% 以下,失业问题将引起严重的社会不安。该文进一步指出:除了金融风暴的影响外,中国、东亚存在着景气长期低速、国有企业营运不良、高失业率,以及金融体制不健全等问题,这些因素将使得中国经济在逃过金融风暴之后,仍会陷入萧条之中。中国改革开放已二十年,但全国仍有三分之二的投资由政府主导,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必须认识到,市场力量才是真正必要的因素。要么开放市场竞争,要么就是等着经济垮台。中国

只有让市场发挥力量,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复苏。^①

中国经济改革需要外力的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国际市场以后,其行为规范必须按照国际标准建立。这就是中国加入 WTO 最深刻的意义,也是以江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的深谋远虑。

本书的观点、看法均为作者本人的一管之见,绝对不能代表出版者的观点。我的这些观点虽然是在多年的经济研究和经济工作实践中形成的,自认为并非信口开河,但难免偏颇、疏漏,甚至谬误之处,一方面我愿意文责自负,另一方面我衷心地欢迎一切对本书善意的批评,特别是期待学界同行们坦率的意见。在此,我预先向您们致谢。

贺晓东
1999年12月

① 大卫·藤格森(经济学家),封面,1999年第10期。

目 录

进入 WTO 前后的中国(代序)	(1)
------------------------	-------

第一篇 导论:经济改革何去何从

第一章 渐进之路,是否幸运之路.....	(3)
一 改革选择了渐进,幸运拥抱了中国	(3)
中华民族最后的吼声	(3)
改革没有蓝图	(4)
二 使命:完成资本转化	(6)
第一个改革宣言	(6)
改革与产权制度	(7)
费孝通妙言“所有权”	(10)
所有权制度带来了现代经济增长	(11)
改革要经历新制度“分娩”的阵痛	(13)
三 改革三阶段	(14)
四 “搁浅”在所有权问题	(20)

摸不着石头就过不了河	(20)
走不通的“承包制”	(22)
柳暗花不明	(23)
五 十字路口的后顾前瞻	(25)
第二章 改革的结构演化与双轨体制	(28)
一 目标模式	(28)
二 路径选择	(30)
改革路径可以选择	(30)
“保守疗法”与“外科手术”	(31)
渐进与改良	(33)
一锅“夹生饭”	(34)
三 双轨制的形成	(35)
放权让利形成双轨制	(35)
诸侯经济与准商品生产者	(36)
四 不完全市场的特征	(37)
五 企业目标:个人收入极大化	(39)
六 企业行为:贿赂与短期化	(40)
贿赂怎样成为企业行为	(40)
贿赂的作用	(42)
企业行为短期化	(43)
七 “双轨制”的效率	(44)
收入与成果挂钩并非总能提高生产率	(44)
收入高攀比,效率低攀比	(46)
八 双轨制的调节与均衡	(47)
双轨调节:市场行政化,权力经济化	(47)
两种体制互相渗透、互相侵蚀	(48)

非均衡的双轨调节	(49)
九 出路:面临新的选择	(50)
不规范导致功能异化	(50)
非稳态的双轨体制	(52)
选择:创新还是崩溃,时机只有一次	(55)
第三章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57)
一 物价负增长,不亦乐乎	(57)
二 走出短缺,就是买方市场吗	(60)
三 渐进式的改革与自发私有化的成本	(63)
四 改革:留下买路钱	(71)
五 资金短缺与金融政策的困惑	(77)
六 经济增长的咏叹调	(80)
七 谁是国有企业的老板	(84)
八 中国保险业的“祸”与“福”	(87)
九 政府的“弱地位”与“强作用”	(91)
十 机构越消越肿	(95)
十一 贪渎越来越烈	(101)
十二 东亚金融风暴擦身而过,福焉? 祸焉?	(110)
十三 外汇储蓄并非多多益善	(111)
十四 主旋律:启动内需与国企脱困	(114)

第二篇 求解国企改革方程式

第四章 本来就是一个死结——谈国企效益问题	(125)
一 中国的“哥德巴赫猜想”	(125)

国企改革正未有穷期	(125)
“嫁接”试验	(126)
捷径并非近路	(127)
二 国企效益大滑坡	(128)
三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132)
二元体制结构:国有与非国有	(132)
国有、非国有经济地位的变动	(132)
无意插柳柳成荫	(135)
四 为什么喜欢“红帽子”	(136)
“红帽子”价值几何	(136)
是亲三分向	(137)
“红帽子”里有特权	(137)
企业呼吁公平	(139)
五 国企经营难在何处	(140)
亏损缘于“政策性”	(140)
国家要撒手了	(142)
银行能顶替财政吗	(143)
六 怎样“搞活”国企	(144)
仙女下不了“凡”,国企脱不了“胎”	(144)
国有企业岂能自负盈亏	(145)
财政赖国企的账,国企赖银行的账	(147)
亲妈狠毒:“断奶”加“放血”	(148)
七 国家也有难处	(149)
第五章 分不开的“政企”	(152)
一 从“两权分离”到“政企分开”	(152)
同义反复的改革	(152)

一次“环绕地球的旅游”	(153)
二 政企分开没有先例	(154)
国有企业看世界规范	(154)
国企本是“政企不分”	(157)
三 读一点理论史	(158)
“看不见的手”并非万能	(158)
关于市场缺陷	(158)
市场也需要“看得见的手”	(160)
四 政府干预的重要手段	(160)
政府的政策工具	(160)
真正的“经济手段”	(162)
国有企业与工业化发展战略	(163)
五 政府干预国企的根据	(164)
国企特性与“政企分开”不无矛盾	(164)
国企的制度逻辑	(166)
六 脱离所有权的监控与国企改革	(167)
国资流失的堤防在这里决口	(167)
所有者与经营者	(169)
模糊产权、弱化所有权约束是自挖墙脚	(170)
打工者为什么不买老板的账	(172)
七 假如国企的自主权扩得同民企一样大	(172)
政府干预不能少	(172)
从产权关系去理解国企性质	(175)
把“羊群”交给“狼”看管	(176)
第六章 国有企业岂能唯利是图	(178)
一 公共目标还是利润目标	(178)

在中国,国企意味着什么	(178)
西方国家国企也为社会服务	(180)
国企是一种政策工具	(181)
二 国有企业的目标选择	(183)
政策性行为影响国企效益	(183)
国企目标的双重性	(184)
目标选择中的所有权决定	(185)
三 决策还是政府当家	(186)
四 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差异	(189)
政府目标何其多	(189)
政府有病,企业吃药	(191)
政府企业化,企业行政化	(191)
一个案例	(193)
五 国有企业与利润刺激	(194)
产权安排与利润刺激	(194)
短期化利益与短期化行为	(195)
第七章 国有化与市场经济	(198)
一 从国有经济到国有化	(198)
市场有“两只手”	(198)
政府干预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	(199)
极端的政府干预:经济计划化和国有化	(200)
政府干预过度的危害	(201)
单一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有冲突	(203)
二 普遍的国有化实质上是一种指令经济	(204)
市场经济前史:指令经济与习俗经济	(204)
非市场的国有经济 = 指令经济	(205)